

諾要擺脫落後，並在世界事務中發揮作用，與此同時實現了統治。於是，對現代性的追求本身就成為權力施展的舞臺。

拉弗認為中國的現代性是「其他現代性」，這是與西方的現代性相比較而言的。或許是因為，她面對的是英美讀者，所以並沒有著力交待與「其他」相對的「一般」現代性到底意味著甚麼。但是，一個基本的判斷是，現代性在歐美不會成為一種意識形態構成要素；而在中國，它是如此的重要，以至成為政權合法性的意識基礎，也是日常控制得以實現的技術基礎。

總之，作為一個人類學家，拉弗沒有從抽象的制度入手，而是仔細觀察普普通通的女工的工作、生活，言行、舉止，深入研究她們的身份認同。她找到了一個捕捉歷史的巧妙的角度，即比較三代女工之間的差異，使歷史變得可以觸摸，這可能是本書的一個重要貢獻。

李錡金
清華大學

***Civilizing Chengdu: Chinese Urban Reform, 1895-1937.* By STAPLETON, KRISTI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0. xii, 341 pp.**

司昆侖(Kristin Stapleton)這部著作以晚清到 1930 年代成都的城市改革為主題。過往對 20 世紀上半葉中國城市變化的研究，大多著眼於沿海省份的城市、租界(特別是上海)或國家首都。此書把注意力轉移到成都這個內陸城市，展示了晚清到民國時期中國城市的巨大變化，不單發生於與西方力量接觸頻繁的沿海租界，同時也出現在中國的內陸地區。此為這部著作的重要貢獻之一。

此書共分為八章。第一章是成都作為四川省會的地理及行政架構的基本介紹。第二至第四章分析晚清「新政」，尤其是警察制度的推行。第五至第七章則敘述辛亥革命至 1930 年代的政治變化(包括清政權倒台後哥老會的興起，和軍閥混戰帶來的不穩定)，以及楊森及他下台後的「市政」改革。最後一章則總結這些政策為成都帶來的變化，同時比較成都與其他如上海、廣州、北京等大城市的改革不同之處。

作者認為在成都從清末至 1930 年代的城市改革中，最重要的兩個階段是 1900 年代的「新政」及 1920 年代的「市政」改革。作者以這兩個階段的主要改革者(即「新政」時期曾先後出任警察局總辦及勸業道總辦的周善培，以及「市政」改革時期的軍閥楊森)的改革措施，來帶出兩個時期的改革重點及相異之

處。首先，「新政」時期的城市改革本意並不是針對城市，當時的改革者並沒有城鄉分野的概念。只是因為改革源自國家官員，因而便順理成章在地方政府的所在地——省城——開始，再慢慢向四周推進。到了 1920 年代的「市政」改革，才發展出一套特別針對城市的改革措施。其次，「新政」時期改革的參照模式，是經歷了明治時期「文明開化」的日本。改革的重點是通過建立警察制度來控制民眾，尤其是乞丐和妓女這些社會邊緣人，以加強地方的秩序。而 1920 年代的「市政」改革，則以上海及廣州為學習對象。改革者引入科學和理性等新概念，以對城市空間進行規劃。最後，作者指出由於這一連串的變革，最終造成了 20 世紀中國的「城鄉分化」現象。

而作者所說的「城市改革」(urban reform)，究竟包括甚麼內容呢？作者對此並沒有作明確的界定，而似乎把官員及知識分子所提倡或推行、為了使成都變得「文明」「進步」的政策都納入書中，當中包括建立警察制度、約束乞丐和妓女、禁鴉片、移風易俗、建築公眾廁所及公園、修建道路及商場、成立地方議會、推動平民教育及體育活動等等。由於作者涵蓋的「城市改革」範圍廣泛，因而除了對「新政」中的警察制度有較深入的分析外（包括警察的職權、選拔條件、訓練、甚至所穿的制服樣式），其他層面都只是作了表面的描述，分析缺乏深度。

涵蓋課題過份廣泛，除了影響分析的深度外，也牽涉到研究取向的問題。究竟是否國家所推行的、以規範社會為目的的政策，研究者就必須認同為「改革」？我們除了考慮官員或改革者的理念和措施外，是否亦要多點關注民眾的聲音？對民眾來說，這些官方政策，究竟是「改革」，還是對他們生活的干預？當然，歷史學家的責任並不是要對些政策作價值判斷，評定誰是誰非。但他們有必要跳出過往「由上而下」的分析框框，進而多考慮不同社會群體的聲音和面貌。

這並不是說作者完全忽視不同群體反應的重要性，但很明顯書中沒有提出充分的資料來回答此問題。作者在比較周善培時期與楊森時期的政策時，指出周善培的改革得到地方精英和民眾的支持，而楊森則作風獨裁，未能考慮地方精英的反應，因而改革遇到強烈的反對聲音。在討論楊森的部分，即第六及第七章，作者提到一個名為「五老七賢」、在辛亥革命後由傳統士人組成的群體對楊森施政的不滿。但在周善培的部分，作者雖然多次提及地方的「精英」份子（如頁 78、81、113、248），但並沒有說明他們是誰，在地方政治的角色，以及如何和為何支持周善培的政策，就已作出結論，指周善培由於得到地方精英的支持，因而「新政」是成功的。由於作者未能提出充分的論證，因而削弱了論點的說服力。

另外，書中有兩點是值得作者再多加討論的。首先，作者指出推動成都改革者進行革新的，是日本「文明開化」的概念。不容否認，日本為當時中國的改革者提供了具體的改革藍本，作者在書中亦提出了不少資料作論証。但從清末到民國，實際推動革新的動力，是源於由達爾文提出、而由嚴復引入的「進化」理論。由於這種直線歷史發展的思考模式，令改革者認為傳統文化有礙「進化」，因而要急切進行改革。作者若能對當時推動革新的思潮作較細緻的分析，可以令讀者對改革的背景有更深入的了解。

其次，作者錯過了許多可以進一步作深入討論的地方。例如作者提到由於警察制度的引入，不少地方的廟宇成為警察分局，其中一所廟宇為財神廟。1909年，當地人向當局表示希望警局能暫時遷出，讓他們舉行神誕，當局斷然拒絕，指對公眾來說，警政應比神誕重要（頁148）。作者並沒有進一步分析這件可充分反映民間與施政者的觀念衝突的事件。由於放棄對這類事件的考察，清末的警政在作者筆下成為得到當地人民廣泛支持讚賞的措施。另一個例子是成都的「花卉節」。作者指這個「花卉節」在民國以前已是成都重要的社區活動之一，在清末開始則隨著政府對工商業發展的重視，慢慢演變成宣傳工商業的「商業勸工會」（頁22，140）。這是非常有趣的事例，可以反映民眾的活動如何隨著「城市改革」而變化，可惜作者對此活動著墨甚少。另外，若作者能分析在清朝時期的「花卉節」(Annual Flower Festival)主辦者，或可幫助解答上文提到的成都「地方精英」的構成問題。這兩點亦反映了作者對施政者的興趣，遠高於這些政策下的社區活動的變化。

總括而言，此著作的貢獻在於展現成都這個內陸城市，自清末到1930年代改革政策的發展脈絡，當中以警察制度有較深刻的分析。讀者亦可從中了解到兩次改革浪潮在重點上的差異。但若希望了解改革下成都民眾生活的變化，此書則未能令人滿意。

潘淑華
香港科技大學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y PAMELA KYLE CROSSLE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2002. xiv, 403pp.**

本書不少篇幅是分析乾隆時期(1736-1795)，清王朝如何透過身份的界定，來統治多元文化組成的大清帝國。柯嬌燕(Pamela Crossley)指出，乾隆皇帝所代表